

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毛雅馨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绵阳

摘要 | 为理清亲子冲突对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品行问题的预测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838名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关系，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和民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688名藏族女中学生和146名彝族女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1）藏族和彝族女中学生的亲自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都呈显著负相关，与品行问题都呈显著正相关；但对于藏族女中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显著正相关，而对于彝族女中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负相关；（2）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民族调节了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正向预测品行问题的路径，即相较于藏族女中学生，彝族女中学生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其品行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不仅增进了我们对亲子冲突影响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品行问题的理解，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他们更有针对性地防止和减少中学生品行问题的产生。

关键词 | 亲子冲突；品行问题；少数民族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品行问题是指个体产生与社会规范及其年龄不相符合、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2013），如：撒谎、偷东西等。儿童青少年品行问题检出率在增加（Mohammadi et al., 2021），且若不缓解易演化为辍学、实施暴力、犯罪等更为严重的后果，给个体、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与负担（Blair et al., 2014）。

作者简介：毛雅馨，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青少年心理健康。

文章引用：毛雅馨. 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6 (7): 1165-1174.

<https://doi.org/10.35534/pc.0607130>

此外，有研究发现女中学生品行问题检出率高于男中学生（吴等，2024），同时以往针对中国少数民族中学生的品行问题相关研究很少，而影响个体品行问题的因素是综合的，体现在个体、家庭社区、社会文化等多层面（Blair et al., 2014）。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父母的拒绝行为（排斥孩子，表现为言语或身体惩罚等）可增加学龄前儿童品行问题的发生风险。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父母的拒绝行为起示范作用或通过影响儿童情绪调节导致儿童品行问题。此外，学生品行问题对个体之后的社会适应等都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的品行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探索。

家庭是个体初步社会化的港湾（Bronfenbrenner and Morris, 2007; Eales et al., 2021; Sheridan et al., 2004），为个体应对青春期的复杂发展任务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根据家庭系统理论（Bowen, 1966），家庭作为一个系统，父母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会深刻地影响孩子，包括品行问题。亲子冲突属于亲子关系，影响着家庭系统的运作——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与亲密程度，进而深入影响孩子的心理与行为发展特别是人际交往方面，过于激烈、高频率的亲子冲突会破坏家庭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烦躁、不良社交等身心问题（张、訾，2012）。此外，研究表明亲子冲突的强度与孩子的反社会行为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孩子经历亲子冲突的频率越高就会表现出越多的身心症状（Shek and Ma, 200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亲子冲突正向预测品行问题。

自我概念是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建构与发展起来的关于自我及其与环境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认知，是个体用于解释自己内部过程和跨场域、跨时间各种人际互动的一种动态结构（Markus and Wurf, 1987）。而家庭是个体初步社会化的港湾，尤其在个体早期，亲子关系在个体自我概念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呈正显著相关（Na et al., 2018）。根据自我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杜等，2023），处境不利（包括家庭不和谐）（Xiang et al., 2021）和处境冲突，即个体自我概念得不到他人支持（Stinson et al., 2010）都会增加个体自我概念整合的困难，从而降低其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与父母存在越多的亲子冲突，意味着其很难从父母那里得到理解、支持，同时很难与父母共享感知与认识世界、自我的方式、心得，从而对自己产生各方面的怀疑，导致迷茫、疑惑、无措，进而使其自我概念清晰性降低（Light and Goldberg, 202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亲子冲突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与行为产生具有重大作用，不断完善自我建构是个体终生的任务（Adam et al., 2018; Slotter and Walsh, 2017），且拥有高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个体人格成熟的标志（Lodi-Smith et al., 2017），更是身心健康与良好社会适应的基础（Coutelle et al., 2019; Lee-Flynn et al., 2011）。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Campbell认为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对自己认知能力缺乏自信，进而自主性和自控力较低，容易被外界左右，容易产生茫然、无措等感觉（Campbell et al., 1996）。有研究发现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消极情绪（包括焦虑抑郁、压力感、孤独感等）呈显著正相关（Campbell, 1990）。有研究者发现高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于处在压力环境中的个体具有保护和缓冲作用（徐海玲，2007）。此外，自我概念清晰性与个体的行为问题紧密相关，在品行问题的改善中发挥重要

作用 (Levey et al., 2019); 处于困境时, 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方式应对 (Smith et al., 1996); 在面对冲突时, 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问题解决策略, 而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竞争或退步策略 (De Dreu et al., 2000); 有研究发现, 在受挫时, 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越容易产生言语攻击行为 (Stucke and Sporer, 2002)。可能相较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 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由于对自我认知能力缺乏, 容易被他人 (外界) 影响, 产生对自我的怀疑、矛盾与冲突感, 同时其自我调控能力有限, 在受挫、压力情境下, 无法有效应对, 采取消极行为策略, 进而产生品行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 自我概念清晰性负向预测品行问题。

亲子关系受到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互动方式、父母在养育中的角色, 以及家庭分工等因素影响 (Schor, 2003)。藏族存在多种婚姻形态, 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体, 同时包含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度, 且一妻多夫的现象也较普遍 (雷, 2003), 彝族为一夫一妻制度 (王、张, 2018), 且彝族社会结构正从传统的“家支”社会逐渐转变为“半家支文化”社会 (罗、刘, 2021)。根据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中成员的变化会影响其他成员及其关系 (Bowen, 1966), 进而影响了亲子关系 (包括亲子冲突)。自我概念的整合难度受到文化的影响 (Campbell et al., 1996), 有研究发现相较西方文化背景个体, 东方文化背景的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更低, 东亚文化的辩证观念包含更多冲突内容 (Spencer-Rodgers et al., 2010), 可能会加大个体自我概念整合的难度, 从而出现自我概念清晰性更低的情况。藏彝文化存在差异, 藏族民众热衷转山等仪式性或民俗性活动, 通过文化和族群记忆增强地域群体凝聚力与文化、群体认同, 进而影响其自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 (徐上斐、倪, 2023; 刘, 2009)。以往研究多关注中国汉族青少年的品行问题情况, 关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品行问题的检查覆盖率不够全面, 因此本研究将中国藏族、彝族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 民族会调节各个路径。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大部分采用在线问卷收集平台问卷星收集, 少部分因无法使用问卷星而采用纸质问卷收集,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向中国四川省内绵阳市、乐山市等8个地市州的11所中学学生投放问卷。问卷收集主要是本研究组工作人员深入学校班级进行数据采集, 少部分通过远程指导学校心理老师进行问卷数据收集。共发放838份问卷, 最终用于研究的数量为834, 回收率为99.5%。其中藏族女中学生688 (82.5%), 彝族146 (17.5%); 生源为城镇的761 (91.2%), 为农村的73 (8.8%); 家庭经济地位为高的118 (14.1%), 为中的221 (26.5%), 为低的495 (59.4%); 为留守学生的101 (12.1%), 为非留守的733 (87.9%); 为独生的女中学生116 (13.9%), 为非独生的718 (86.1%); 其中父母关系质量良好的有635 (76.1%), 父母离异或为单亲家庭的学生91 (10.9%), 父母关系质量不好但未离异的学生108 (12.9%); 平均年龄 15.60 ± 1.88 。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的测量采用亲子冲突量表 (Object, n.d.)。该量表包含6个题目, 采用从“1” (从不) 到“5” (总是) 的5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亲子冲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为0.86。

2.2.2 品行问题

品行问题的测量采用困难与长处问卷中的品行问题分量表 (Goodman, 1997)。该分量表包含5个题目, 采用从“1” (不符合) 到“3” (完全符合) 的3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品行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 α 为0.58。

2.2.3 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测量采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Campbell et al., 1996)。该量表包含12个题目, 采用从“1” (非常不同意) 到“5” (非常同意) 的5点计分, 其中题项6、11为反向计分, 总分越高表明自我不确定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为0.91。

2.3 数据分析

首先是进行数据预处理, 无效问卷被过滤按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剔除作答时间少于300s的问卷, 之后删除含有未答题项的问卷, 然后剔除连续相同作答6个及以上题目的问卷, 最终将问卷各量表总分标准化删除含Z值的绝对值大于等于3的个案, 剔除问卷4份, 有效问卷数量为834份, 有效回收率99.5%。

随后进行数据分析, 先采用频率对有效被试分布情况进行了解, 所有定量数据均以均值和标准差来表示。随后使用SPSS 27.0软件,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民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 再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描述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等变量的相关关系,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不同家庭经济地位女青少年在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之间的差异情况。之后, 采用海耶斯 (Hayes) 开发的宏SPSS PROCESS4.1程序中的Model 5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 (Hayes, 2013), 使用简单斜率方法检验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 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27.08%) 没有超过临界值50% (Podsakoff and Organ, 1986), 因此, 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不大。

3.2 民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1可知, 藏族女中学生的年龄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得分均显著高于彝族女中学生。

表 1 年龄、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品行问题在民族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ethnic differences in age, parent-child conflict,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character problems

	总体 ($M \pm SD$)	藏族 ($M \pm SD$)	彝族 ($M \pm SD$)	t
年龄	15.60 ± 1.88	15.88 ± 1.78	14.25 ± 1.77	10.11***
亲子冲突	10.70 ± 4.67	11.04 ± 4.82	9.10 ± 3.44	5.74***
自我概念清晰性	38.30 ± 9.78	39.10 ± 9.76	34.52 ± 8.95	5.22***
品行问题	8.34 ± 2.07	8.54 ± 2.09	7.40 ± 1.70	7.08***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3.3 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的相关

对藏族和彝族女中学生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以及人口学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藏族与彝族女中学生的变量相关模式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负相关，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呈显著正相关；但在藏族女中学生中，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正相关，而对于彝族女中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负相关。将家庭经济地位作为自变量，将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品行问题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发现藏族女中学生中和低层次的家庭经济地位对应的亲子冲突和品行问题之间都有显著差异，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在亲子冲突得分上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对于彝族女中学生，没有发现类似差异。具体方差分析结果可见以下附件。

表 2 主要变量的皮尔逊相关 (N=834)

Table 2 Pearson's correlation of the main variables(N=834)

	1	2	3	4	5	6
1.年龄		0.18*	-0.05	0.22**	-0.01	0.01
2.留守与否	0.11**		0.06	0.15	-0.08	0.06
3.独生与否	-0.04	-0.14**		-0.08	0.06	-0.07
4.亲子冲突	0.04	0.19**	-0.14**		-0.34**	0.53**
5.自我概念清晰性	0.06	-0.01	-0.05	-0.09*		-0.32**
6.品行问题	0.13**	0.20**	-0.16**	0.40**	0.08*	

注：对角线上下数字分别为彝族和藏族女中学生的相关分析；* $p < 0.05$ ，** $p < 0.01$ ，下同。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发现年龄、留守与否、独生与否对品行问题存在显著影响，故将三者作为协变量纳入方程，对连续变量作标准化处理，通过PROCESS4.1中的模型58进行检验 (Hayes, 2013)。以亲子冲突为自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亲子冲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正向预测品行问题；亲子冲突与民族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民族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品行问题；表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民族、品行问题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起部分中介作用，民族调节中介路径。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M			Y		
	β	<i>t</i>	95%CI	β	<i>t</i>	95%CI
常数	-0.15	-0.39	[-0.90, 0.60]	-0.45	-1.34	[-1.11, 0.21]
1	0.03	1.58	[-0.01, 0.07]	0.04	2.14	[0, 0.07]
2	-0.01	-0.14	[-0.23, 0.20]	0.28	2.90	[0.09, 0.47]
3	-0.20	-1.95	[-0.39, 0]	-0.26	-2.95	[-0.44, -0.09]
X	-0.10	-2.55	[-0.17, -0.02]	0.36	11.27	[0.30, 0.42]
M				0.10	2.99	[0.03, 0.16]
W	-0.55	-5.45	[-0.74, -0.35]	-0.34	-3.86	[-0.52, -0.17]
X × W	-0.35	-2.99	[-0.57, -0.12]			
M × W				-0.26	-3.12	[-0.43, -0.10]
R^2		0.07			0.25	
<i>F</i>		6.35***			24.92***	

注：1为年龄；2为是否留守；3为是否独生；X为自变量亲子冲突；M为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W为调节变量民族；Y为因变量品行问题；*** $p < 0.001$ 。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民族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用简单斜率方法进行检验，分为藏族和彝族，分别进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藏族女青少年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彝族女青少年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间的中介效应得到增强。

表4 不同民族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concept clarity across ethnic groups

民族	中介效应值	Bootstrap SE	95%CI
藏族	-0.01	0.01	[-0.02, 0]
彝族	0.07	0.04	[0.01, 0.16]

4 讨论

4.1 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的相关

本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呈显著相关，并且亲子冲突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正向预测品行问题。这一结果得到家庭系统理论的支持——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形成与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紧密相关（Beavers and Hampson, 2000），包括亲子冲突。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不清晰，同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藏彝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都呈负相关，且亲子冲突都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即亲子冲突越多，自我概念清晰性得分越低，自我概念越清晰。这个发现与自我概念结构三元假设中处境不利如家庭氛围不佳、缺乏支持的个体自我整合困难而自我概念更不清晰不相符合（杜等，

2023)。可能本研究对象藏彝族女青少年较之前研究存在差异与独特性，即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关系受到民族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原因需要之后进一步纳入纯汉族地区汉族、多民族地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验证。

4.2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亲子关系的重要作用。藏彝族女青少年的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可以用自我概念清晰性加以解释。以往研究指出适度的亲子冲突对个体思考自我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青少年期望能够独立自主，与父母的情感分离有利于他们的同一性和社会性的发展（Steinberg, 2001），从而使自我概念更加清晰，而自我概念清晰的个体对自我情绪与行为具有更高的自知力与调控能力（徐海玲, 2007），因此更不容易出现品行问题（Levey et al., 2019）。但过于频繁且未能有效解决的亲子冲突对自我概念清晰性具有显著影响，频繁且未能有效解决的冲突往往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知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若冲突能够通过健康的沟通和解决机制得到适当处理，也有可能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发展。因此，促进健康的亲子关系和有效的沟通技巧，对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具有重要意义。藏彝族女青少年相较于汉族青少年，她们与父母之间可能存在更多的冲突；因为相较于父母她们在学校学习汉语及汉文化，更多地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接触外界，即她们相较于父母汉化程度更高，在许多概念上与深受其民族文化熏陶的父母存在差异，进而越容易产生亲子冲突，而这种冲突可能加深她们对自身的探索和理解，而表现出拥有更清晰的自我概念。但以往针对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日后可根据上诉推测进行验证。

4.3 民族在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品行问题中的调节作用

模型整合表明，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品行问题的预测路径中，中介路径受到了民族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与藏族女青少年相比，彝族女青少年的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品行问题的影响更强。此外，藏族女青少年在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彝族女青少年；藏族女青少年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正相关，而彝族女青少年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说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及其关系具有民族差异性。

5 结论

研究发现：（1）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正向预测其品行问题；（2）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民族调节了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正向预测品行问题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Adam H, Obodaru O, Lu J G, et al. The shortest path to oneself leads around the world: Living abroad increases self-concept clarity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8 (145) :

- 16–29.
- [2] Beavers R, Hampson R B.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 .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 (2) : 128–143.
- [3] Blair R J R, Leibenluft E, Pine D S. Conduct disorder and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in youth [J] .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4, 371 (23) : 2207–2216.
- [4] Bowen M. The use of family theory in clinical practice [J] .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1966, 7 (5) : 345–374.
- [5] Bronfenbrenner U, Morris P A.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M] //In W. Damon & R. M. Lerner (Eds.) ,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st ed.) . Wiley, 2007.
- [6] Campbell J D. Self–esteem and clarity of the self–concept [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9 (3) : 538–549.
- [7] Campbell J D, Trapnell P D, Heine S J, et al. Self–concept clarity: Measurement, personality correlat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 (1) : 141–156.
- [8] Coutelle R, Goltzene M A, Bizet E, et al.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functions in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without Intellectual Deficiency [J] . *Frenc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9 (1) : S110.
- [9] De Dreu C K, Weingart L R, Kwon S. Influence of social motives on integrative negotia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test of two theories [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 (5) : 889–905.
- [10]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TM, 5th ed (pp. xlv, 947) [M] .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2013.
- [11] Eales L, Ferguson G M, Gillespie S, et al. Family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 mixed methods study [J]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1, 57 (10) : 1563–1581.
- [12] Goodman R.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 research note [J] .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1997, 38 (5) : 581–586.
- [13] 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pp. xvii, 507) [M] . Guilford Press, 2013.
- [14] Lee–Flynn S C, Pomaki G, Delongis A, et al. Daily cognitive appraisals, daily affect, and long–term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in the stress process [J] .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1, 37 (2) : 255–268.
- [15] Levey E K V, Garandeanu C F, Meeus W, et al. The Longitudinal Role of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Best Friend Delinquency in Adolescent Delinquent Behavior [J] .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9, 48 (6) : 1068–1081.
- [16] Light A E, Goldberg M H. Failure to Share Re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Self–Concept Clarity [J] . *Social Cognition*, 2020, 38 (1) : 62–96.
- [17] Lodi–Smith J, Spain S M, Cologgi K, et al.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clarity and content in adulthood [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7, 112 (5) : 755–768.
- [18] Markus H, Wurf E. The dynamic self–concep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7 (38) : 299–337.
- [19] Mohammadi M R, Salmanian M, Keshavarzi Z.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Conduct Disorder: A Systematic

-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Iran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1, 16 (2) : 205-225.
- [20] Na J, Chan M Y, Lodi-Smith J, et al. Social-class differences in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well-being [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8, 23 (7) : 951-960.
- [21] The Child Effect in Media Use: Investigating Family Dynamics Concerning Media Behavior in Parent-Child Dyads [EB/OL]. [2024-06-26]. <https://core.ac.uk/reader/251201374>.
- [22] Podsakoff P M, Organ D W.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6, 12 (4) : 531-544.
- [23] Schor E. Family Pediatrics: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the Family [J]. *Pediatrics*, 2003, 111 (6 Pt 2) : 1541-1571.
- [24] Shek D T, Ma H K.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 Chinese context [J]. *Adolescence*, 2001, 36 (143) : 545-555.
- [25] Sheridan S M, Warnes E D, Cowan R J, et al. Family-centered positive psychology: Focusing on strengths to build student success [J].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4, 41 (1) : 7-17.
- [26] Slotter E B, Walsh C M. All role transitions are not experienced equally: Associations among self-change,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J]. *Self and Identity*, 2017, 16 (5) : 531-556.
- [27] Smith M, Wethington E, Zhan G.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preferred coping styl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6, 64 (2) : 407-434.
- [28] Spencer-Rodgers J, Williams M J, Peng K.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s of Change and Tolerance for Contradiction: A Decade of Empirical Research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14 (3) : 296-312.
- [29] Steinberg L. We know some thing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1, 11 (1) : 1-19.
- [30] Stinson D A, Logel C, Holmes J G, et al.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self-esteem: Testing the epistemic and acceptance signaling system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9 (6) : 993-1013.
- [31] Stucke T S, Sporer S L. When a grandiose self-image is threatened: Narcissism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as predictors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aggression following ego-threat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2, 70 (4) : 509-532.
- [32] Xiang G, Li Q, Du X, et al. Links between family cohe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dolescents and early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hope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2, 41 (1) : 76-85.
- [33] 刘亚玲. 朝圣与转山——丹巴藏族转山考察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9 (2) : 55-59.
- [34] 吴迪, 刘琴, 吴文懿, 等. 家庭与生活环境对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影响研究 [J]. *中国健康教育*, 2024, 40 (3) : 261-265.
- [35] 张娥, 訾非. 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及其与安全感和特质焦虑的关系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 (6) : 854-857, 860.
- [36] 徐上斐, 倪依克.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性演进——基于康定转山的田野调查 [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3 (5) : 20-26.
- [37] 徐海玲. 自我概念清晰性和个体心理调适的关系 [J]. *心理科学*, 2007 (1) : 96-99.

- [38] 杜晓鹏, 蒋奖, 蒋文, 等.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 基于自我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的新视角 [J]. 心理科学, 2023, 46 (1): 170-180.
- [39] 王卓, 张伍呷. 凉山彝族婚姻制度的松动与走向研究——兼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8, 39 (3): 173-180.
- [40] 罗兴佐, 刘天文. 从家支社会到半家支化社会: 凉山彝族社会结构的嬗变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32-39.
- [41] 雷明光. 近代藏族婚姻家庭研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 (2): 65-6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duct Problems among Ethnic Minority Female Adolescents in China: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Mao Yax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predictive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o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em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duct problems. The present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thnic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duct problems among 838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688 Tibetan and 146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oth Tibetan and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person conflic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duct problems; however, for Tibetan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duct problems, while for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nduct problems. (2) Self-concept clarit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duct problems; (3) Ethnicity moderated the path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through self-concept clarity to positively predict conduct problems, i.e., parent-child conflict through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a stronger positive predictor of conduct problems in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an in Tibetan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on the behavioral problems of ethnic minority fem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but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ducators to prevent and reduce behavioral problem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more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 Parent-child conflict; Conduct problems; Minority